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学文化源流研究专题

《周易》与《孙子兵法》关系再论

梅寒¹, 雷雪阳²

(1. 山东航空学院 孙子研究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2.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伦敦 999020)

摘要:很多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汲取了《周易》智慧。但从历史上考察, 孙子携《孙子兵法》面见吴王的时候, 孔子还没开始编纂《易传》, 孙子只能看到《易经》, 而《易经》为周文王所编纂, 以记录卜筮为用, 并未着眼于论述天道人性相关的哲学思想, 阴阳爻只做结绳记事之用, 鲜谈辩证思维。另一方面, 《孙子兵法》和《易传》的价值观有较大的不同, 《易传》强调义战, 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导向, 而《孙子兵法》强调逐利, 以攻伐取胜为主要导向, 两种思想的战争导向与形成目的有较大差别。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 儒学成为主流思想, 孙子兵学为了自身生存发展, 也一步步向儒学靠近, 儒家的思想内核也逐渐渗透到孙子兵学的研究中, 丰富了孙子兵学的思想内容。

关键词:《易经》;《易传》;《孙子兵法》;兵儒融合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24.03.004

《周易》与《孙子兵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都很有价值。《周易》中有《比》《师》《同人》等卦描述、解释战争, 很多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智慧源于《周易》。萧新永^[1]和吴荣政^[2]都强调《孙子兵法》的哲学观来自《周易》。吴荣政指出: “孙子唯物天道观和无神论的思想是春秋时期怀疑否定天命鬼神等宗教迷信的进步思想潮流的发展。”^[2]于国庆^[3]和黄荣武^[4]强调《师》卦对《孙子兵法》的价值。黄荣武指出: “‘师出以律, 否臧凶’体现了《周易》关于战争目的、战争性质的思想。后世兵家, 尤其是孙子继承了这一思想。”^[4]扈光珉、韩荣钧指出, 《孙子兵法》在战争观等方面也与《周易》相同^[5]。以上学者忽略了几个问题。其一, 从历史考据上看, 按司马迁《孔子世家》的论述, 《周易》的《易传》部分, 大概为孔子所

作, 而《易传》解经所传达的哲学、思想观念才是学者们认为的《孙子兵法》向《周易》学习的基础, 但历史上孙子和孔子的交集极少。其二, 从思想取向看, 《周易》开创传统儒家理念, 强调义战, 强调仁义, 而《孙子兵法》却强调“利战”,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关系, 二者的价值观有较大差异。故笔者将从历史考据和思想取向两个角度再度剖析《周易》和《孙子兵法》的关系。

一、《孙子兵法》与《周易》: 历史上的交集极有限

(一)《易经》和《易传》辨析

若论《孙子兵法》的智慧是否源于《周易》, 就必先对《周易》和《孙子兵法》的历史情况做简要分析。《周易》的成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

收稿日期: 2024-0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与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21&ZD065)

第一作者简介: 梅寒(1995—), 男, 山东淄博人, 讲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逻辑学、先秦思想研究。

E-mail: 836235744@qq.com

在《周易·系辞传》中记载,三爻卦(八卦)为伏羲所作,作用是结绳记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传》)其二,周文王在羑里将八卦变为六十四卦,“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安书》),并给每一卦和爻配上卦辞、爻辞,形成《易经》。《帛书易》出土以后,此观点由孔子之口予以力证。“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易之义》)其三,孔子作《易传》解读《易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指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当然,学界对《周易》的成书过程一直有争议,尤其《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的问题。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就曾指出,《易传》“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后世如金景芳^[6]、李学勤^[7]等学者则坚持《易传》的道德义理性质应与孔子有关。按《帛书易》,子贡(原文为子贛)问孔子:“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答道:“《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可见,按《帛书易》的说法,将卜筮之易变为“义理之易”,正是孔子的功劳,这与《说卦传》“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关于《易传》的性质,学者们基本认为《易传》是对“卜筮”性的《易经》做“义理”性质的疏解。章太炎认为:“仲尼赞《易》而《易》独贵,其在旧法世传之史,则筮书与卜梦等夷。”^[8]³⁷在孔子“作传解经”^①之前,《易经》就是由太卜之官记录卜筮的作品,只有充满义理价值的《易传》出现以后,《周易》才有了尊贵的地位。《说卦传》开头有如下的说法:“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

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古代的圣人作易是为了“幽赞”“神明”而“卜筮”,通过参两天地、观变阴阳等方式记录成《易经》,即将《易经》作为“占卜”记录。接下来,“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一句,就出现了《易传》对《易经》的一种扭转。鞠曦在《易道元贞》中认为,此处的“发挥”“和顺”意味着主体已经从“昔者圣人”转向了“今者说卦人”^[9]¹²⁴,也就是说从此处开始,《周易》已经从《易经》的“卜筮性”转向了《易传》的“义理”性质。这在《系辞传》中也有所印证:“《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0]²⁰⁵即是说,《易经》成书年限太过久远,内容复杂纷乱,“不可为典要”,所以要“唯变所适”。在“发挥”“和顺”之后,《说卦传》作者点明了《易传》的旨趣“刚柔生爻”“道德理于义”,最后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9]²⁰⁹。

这是说《易传》最终要谈论的问题为“理”“性”“命”。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认为:“理,谓随事得其条理,析言之也。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圣人作《易》之极功也。”^[9]²⁰⁹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有自己的规则、性质,《易传》的目的是要用《易经》的系统阐明这个规则。《易传》作者认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这种“性命之理”包括三个层面:“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9]²⁰⁹用“阴”和“阳”来描述“天道”,用“柔”和“刚”来描述“地道”,用“仁”和“义”来描述“人道”,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易传》将借助“天道”的“阴阳”与“地道”的“柔刚”谈论关于“仁义”等道德问题。“天道”的“阴阳”和“地道”的“柔刚”,“卦象”中的阴爻和阳爻及其具备的“刚性”和“柔性”,运用“阴阳”和“柔刚”来“推天道以明人事”,给人的“道德”带来启发。《系辞传》中也有文本可以佐证:“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11]⁴⁰⁸圣人将天地之间最精妙的道理和变化规律蕴于“卦”和“辞”之中,并将这种道理与“天道”“地道”相贯通,运用到人的“德行”即“道

① 笔者认同《易传》为孔子所著的观点。

德”上。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认为：“此六句言《易经》对人之事业之指导功用。”^{[10]408} 此处的“事业之指导功用”应当理解为圣人利用《易经》的系统帮助人们按照“天道”和“地道”建立“人道”即“道德规范”。所以，《易传》对《易经》推类的落脚点将是“卦”对“道德”的“启示”。这也就是说，《易传》将《易经》从一部卜筮性的记录典籍，变成了具有天道人性的哲学著作。

(二) 孙子不可能看到《易传》考

于国庆认为，《孙子兵法》借鉴了《师》卦的思想，尤其是“《师》卦中多次提到‘能以众正’、‘而民从之’、‘君子以容民畜众’”等思想^[3]，但这些内容却非《易经》的《师》卦所有，而是在《易传》中《师·彖》《师·大象》等文献中记载的。扈光珉等学者强调《易传·系辞传》中的阴阳思想，这也非《易经》所能含摄。换言之，这些学者认为《孙子兵法》与《周易》有关的基础在于《孙子兵法》吸取了《易传》的思想。

先弗论《易经》作为一部重要典籍，孙子等人是否有资格阅读，也弗论《易传》这部作品为孔子所著还是后世人所著，本文假设《易传》为孔子所著，那么孙子有机会看到孔子的《易传》，或者说《孙子兵法》问世之前，《易传》是否问世了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阖闾在兴兵伐楚之前，就见到了孙子与《孙子兵法》。按《春秋左传》记载，吴王派伍子胥等人伐楚大概在定公四年。“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了孙子在伐楚前夕被伍子胥推荐给吴王的事情：“胥乃明知鉴辩，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孙子在吴王伐楚的战争中被封为大将，有一定战功。“楚闻吴使孙子、伍子胥、白喜为将，楚国苦之，群臣皆怨，咸言费无忌谗杀伍奢、白州犁，而吴侵境，不绝于寇，楚国群臣有一朝之患。”（《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王阖闾大致在鲁定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06年之前就见到了孙子和《孙子兵法》，此时孔子在做什么呢？

《史记》记载：“鲁大夫以下皆懵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鞠曦考证说：“孔子在四十二岁之前先后当过季氏史、司职吏、司空，因鲁国内乱，孔子于四十二岁第一次辞官退而修书。显然，‘退而修《诗》《书》《礼》《乐》’时在孔子的中年，而不是晚年。”^{[9]78-80} 孔子编修四经大概八年以后。《史记》记载：“定公八年，公山不狂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费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年孔子年五十。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得到任用，一直到58岁，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也是孔子最后的官职。鞠曦接着指出：“由《史记·孔子世家》可知，孔子因‘桓子卒受齐女乐’而去鲁，孔子时年五十六岁（前496年）。孔子历尽坎坷，在经过‘适卫’、‘过蒲’、‘反卫’、‘过曹’而‘至陈’时，孔子时年五十八岁。孔子居陈三年，‘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前492年）；‘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孔子迁于蔡三岁’，所以孔子在蔡的时间也是三年。这就是说，按《太史公自序》‘孔子厄陈蔡作《春秋》’的推断，时在定公十六年到鲁哀公六年的六年时间里‘作《春秋》’。”^{[9]78-80} 总之，鞠曦认为，孔子在42岁至63岁花了21年时间做《诗》《书》《礼》《乐》《春秋》，鲁哀公六年的时候孔子已经63岁了，从63岁到73岁10年时间编修《易传》，确实也与“夫子晚而喜易”的记载接近，《论语·述而》篇所记载的“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也能佐证。

总之，孔子大致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在公元前506年孙子面见吴王阖闾的时候，孔子刚45岁，此时应正在编修《诗》《书》《礼》《乐》。就算鞠曦的推测或者历史记载不够准确，根据《论语·述而》的记载，孔子作《易》肯定要在公元前501年（即50岁）以后。换言之，孙子拿《孙子兵法》面见吴王的时候，孔子还没开始编修《易传》。据此，从历史上看，《孙子兵法》应无法受到《易传》的影响。

(三) 《易经》为卜筮之书，《孙子兵法》与其关联较少

既然《易传》无法影响孙子，那《易经》是否可

以影响孙子呢?一些学者认为《孙子兵法》中的很多智慧来源于《周易》,如吴荣政认为孙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根源是传统五行学说和《周易》的阴阳^[2],刘君祖也尝试用《易经》的思想推演《孙子兵法》的计谋^[12]。但这些学者大多混淆了《易经》和《易传》。刘君祖讲:“再看咸卦。咸卦就是兵学的修炼,损卦是说不要感情用事,咸卦则说明要有极强的感应力、反应力,咸卦就是训练这一点,其《大象传》称‘君子以虚受人’,所有外面重要的资讯,像敌情的分析等各种事态,要能够‘以虚受人’,像山上的天池那样。咸卦的感应快速,反应快,感应快,兵法中就有速战速决的概念。”^{[12]28}“以虚受人”等观念实际上是《易传》而非《易经》所论。《咸》卦卦辞为:“咸:亨。利贞。取女吉。”爻辞为:“上六,咸其辅颊舌。九五,咸其脢,无悔。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初六,咸其拇。”高亨指出:“咸,卦名也。亨即享字,古人举行享祀,曾筮遇此卦,故记之曰又筮遇此卦,举事有利,故曰‘利贞’取借为娶。筮遇此卦娶女则吉,故曰‘取女吉’”。^{[13]213}显然其中无“感应快速”之谈。

实际上,《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几乎不谈“天道人性”。根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周代太卜掌握三种卜筮方法,“三易,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周广庆指出:“中国学人通常所说的《周易》,则是包括《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概而言之,《易经》就是西周时代《周易》的‘经’化,实际上是形成于西周早期的卜筮之书;《易传》是形成于战国后期至汉代初期的诠释《易经》的著作,二者在时间上相距七百多年。”^[14]高亨指出:“《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的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与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11]7}

一些学者也通过《系辞传》“《易》有圣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的观点指出《易经》除

占筮以外的“辞”“变”“象”的价值^[15],但这些价值也鲜有天道、哲学、阴阳、辩证等论。

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讨论的《易经》“阴阳之道”。检索《周易》文本可知,“阴”字出现20次,“阳”字出现19次,“阴”和“阳”大体相对出现,都出现在《易传》中;《易经》中只有《中孚》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张善文解释道:“白鹤鸣叫在山的背阴,它的同类声声应和;我有甜美的酒浆,愿与你共饮同乐。”^{[16]351}换言之,在《易经》中,“阴”只出现过一次,指山的“阴”处,未有《易传》中阴阳辩证统一的含义。而《易经》中的阴阳爻是否有辩证的含义呢?《系辞传》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伏羲做王的时候,观察天地万物,用绳子作出八卦,为了描述各种事物。例如,“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细观《离》卦,由上下两个阳爻和中间一个阴爻构成,确实如同“渔网”一样。换言之,在《易经》中,阴阳爻只是为了描述事物方便的记录方式一样,对阴阳辩证思维的讨论,得在《易传》中才能寻得。而孙子又无法看到《易传》,因此孙子的阴阳谋略等辩证思维,很难与《易经》产生关系。

另外,孙子本人对鬼神卜筮之说也持批评态度:“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孙子兵法》中体现的辩证智慧,如果说孙子从《道德经》中取得智慧或许更加可信,毕竟《道德经》也有“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理论。

二、《易传》与《孙子兵法》的思想取向之别

根据上文可知,孙子无法看到《易传》,最多只能看到《易经》,而《易经》只是卜筮之书,“不可为典要”,无法给孙子提供智慧,其中的阴阳、循环等问题也得在《易传》中才能找到理论原型。后文要继续强调,《易传》和《孙子兵法》从理论层次到价值取向也全然不同,二者的区别可以透露出先秦儒家和孙子的不同价值观。

(一)二者的“道”论非同一层面

《易传》和《孙子兵法》都讲道,但二者的“道”

绝非同一层面。《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阴，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段玉裁注解道：“高明也。闇之反也……不言山南曰易者，阴之解可错见也。”阴最早是“暗”的意思，阳是明的意思。许慎认为，阴就是水的南边和山的北边，从地理上看，这里处于太阳不能直射的地方，所以会“暗”，而大陆则是太阳可以直晒的地方，所以是“阳”。“错见”不是说“错误”，而是错落类比而见之，可以补充为“水之北而山之南”。“阴”“阳”二者最初是根据人对事物的明暗变化确定的，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含义大有不同。但是《易传》的其他解释，例如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所说“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是将“阴阳”和“无极”等思想相贯通，将“阴阳”的含义从单纯的“明暗”对比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张善文也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以阴阳变更释‘道’的概念，即指出事物矛盾对立互相转化的自然规律。”^{[11]381}事物矛盾对立相互转化的自然规律说明“阴阳”成了统摄一切的“最高范畴”，而这个范畴是古人从对山水明暗变化总结提升得到的。

《孙子兵法》讲“道”，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兵者，诡道也”（《计篇》）“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日夜不处，倍道兼行”（《军争篇》）“先居高阳，利粮道”“凡此六者，地之道也”“教道不明”“凡此六者，败之道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战道必胜”（《地形篇》）“凡难行之道者”“由不虞之道”“凡为客之道”“政之道也”（《九地篇》）“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怠于道路”“五间俱起，莫知其道”（《用间篇》）等。此处的道大概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道路”，其二是“关于某事的规律”。例如，“存亡之道”讲的是国家存亡的规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指的是“治国之道”等。换言之，除了一般的“道路”解释外，《孙子兵法》对“道”的抽象理解，只停留在“事”的层面，而没有超越到“所有事物”的层面。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指出：“云何‘究竟名’？寻求一实词不能副，如言‘道’，言‘太极’，言‘实在’，言‘实际’，言‘本体’等。‘道’本是路，今究

竟名中‘道’字，于所论中遍一切地，云何可说为‘道’？‘太极’本是‘大栋’，栋有中义，今究竟名中‘太极’字，于所论中非支堂器，无内无外。”^{[17]202-203}“所论中遍一切地”强调的就是这些究竟名要解释所有问题。

冯友兰认为，概念可以分为三种：“实际底事物”“实际”“真际”。“实际底事物”就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比如“这是一个方块”；“实际”指实体，即对这些方块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的“方性”，所有具备方性的事物都可以称作“方底事物”；“真际”是可以超越实际而具有真实性的概念，或者可以说是真实而不一定实际存在的、以存在为基础的概念，比如“方底”，只是将“方底”作为一个概念去研究，从而引出诸多哲学观念，如整体、宇宙、上帝等。^{[18]30}

总之，《孙子兵法》只是将“道”抽象到“实际”层面，而《周易》则将“道”抽象到“真际”层面，二者绝非同一层面。另外，《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它确实无须对事物的整体情况做探究，只需要把各种在战争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加以描述和解决就足够了。那孙子之“道”是否符合《周易》之“道”的理论呢？下文从战争导向、待人之道两部分讨论。

（二）二者的战争导向不同

《周易》的《师》卦强调“义战”的战争观。

《师》卦：䷆ 师：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

中行也。弟子與师，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师》卦的卦辞为“贞，丈人吉，无咎”，黄寿祺等指出，丈人即“贤明长者”^{[16]52}，即军队的统帅，这种人要有威信，带领军队“正行”，终会吉祥。此处“正道”指什么？

从《易经》看，《师》卦六爻在讲出兵。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出征先要严明纪律，否则会大凶。《周易本义》指出：“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减则凶。”^{[16]53}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黄寿祺等指出，“在师”即“率师”，军队由优秀将领统帅，多次得到君主委任。《象传》也指出这支军队处于“九二”当位，与六五正应，因此“承天宠”“怀万邦”。到此，一支纪律严明、深受信赖的军队形象已然塑造完成。

六三六四情况急转直下。六三：“师或輿尸，凶”。“或”可以指“有人”，輿尸即用车拉着军士们的尸体，结合《象传》“大无功也”可知，这支纪律严明深受宠爱的军队吃了败仗，十分狼狈。

六四：“师左次，无咎”。《周易尚氏学》指出：“古人尚右，左次能退也。”^{[16]54}这支军队因为失败只能后退。《象传》曰：“未失常也。”此处不好理解，清代刘沅认为，“师以慎重为常”。^{[11]55}强调后退是暂时之法，迫不得已。

六五和上六两爻对此次征伐做出总结。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輿尸，贞凶”。“田有禽”指有野生的禽兽来田里吃庄稼，“利执言”可以解释为在禽来侵犯的时候，可以正当地予以反击。虞翻、荀爽、朱熹等人解释为“言辞”，其实解释为言辞也无问题，古人进行征伐，都需要昭告天下。此处虽然以“田有禽”为喻，但喻体应为“他人犯境”，则可师出有名，发布告令，以此“无咎”。

“长子帅师，弟子輿尸，贞凶”这句话的问题在于“贞凶”断语到底指“长子帅师，弟子輿尸”为凶，还是“弟子輿尸”为凶。结合《象》中“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與师，使不当也”和上六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可知，“贞凶”

应指用品德能力不行的人统帅军队，肯定为凶。

那么，“长子”真的就能确保逆境转好吗？从初六至六五我们可以观察到，哪怕军队纪律严明，受到高度赞誉，但如果“长子”领导的部队不是去反击“田有禽”，而是进犯他国的变成“田之禽”，那么仍然可能会遭遇重大挫败。因此，这里的“中行”很可能是指“田有禽，利执言”这样的军事策略。上六中提到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结合六五的“田有禽，利执言”和“以中行也”，可以解读为，如果长子能在与“田有禽，利执言”有关的战役中获得胜利，那么他将会受到君王的特别赏识，甚至有机会成为地方领主。

《师》卦强烈强调“正”这个概念，它一方面代表着军队的正规性和纪律，即“师出以律”之正；另一方面，它要求出兵行动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象》传提到的“刚中而应”，是指卦象中上下两部分的中爻相互应和，即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与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由此可见，《象》传在这里预示了，只有旨在保护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军队，才能获得君主的赏赐，才能获得顺利无碍。“行险而顺”这句中的险和顺可指代下面的“坎”和上面的“坤”。干宝解释说：“坎象征‘险’，坤象征‘顺’，兵革刑狱，所以险民也。”^{[19]129}然而，干宝所提“行险”即为“毒民于险中”的理解似乎不太贴切，此时的《象》并未提及君民关系，只是探讨国家间的征战纷争。因此，此处的“行险”应该和“刚中而应”与“田有禽”紧密相连，从而引申为“应对来自敌军的险境”，这样的解读更符合《师》卦的整体实质和价值理念。“以此毒天下”的“毒”字解释较为困难，《说文》解读为“害人”，段注则解释为“制字本义，因害人之草”，王弼解读为“役使”，马融解读为“治”，而干宝则解释为“六军之锋，残破城邑，皆所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16]53}。综上所述，结合“毒”的原意和“刚中而应”的原则，在“行险而顺”的情况下，“毒天下”可以解读为在必要时采用强硬、果断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这样做旨在保护公众的利益，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忠诚，即“民从之”。黄寿祺、张善文总结道：“马振彪论此卦曰：‘天下归德谓之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民望之如云霓，从之如归市，所谓‘能以众正’，乃可王也。’（《周易学说》）此论似已

道出《师》卦蕴含的早期军事思想的核心所在。”^{[16]56}《师》卦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做《易传》时所体现的人道追求和魄力,正如那句古老箴言所谓“不管发生什么,做你要做的”^{[20]799}。

《周易》中其他如《同人》卦等也大抵有同一含义。(笔者将另撰文论述。)总之,《周易》所传达的战争观核心为“防御”,也可被引申为“义战”,正如魏鸿认为,儒家的道德仁义和王道价值会让战争从争利趋于防守。^[21]《周易》的战争观继承周代,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就强调自己是为了匡扶正义,除暴安良。《尚书·泰誓上》记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这种思路与《司马法》强调“仁本”和“天子之义”相似,但《孙子兵法》的战争观却强调“义”向“利”让渡,“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

很多学者认为孙子是“慎战”的,但是孙子“慎战”目的却不是“不战”或者“义战”,而是基于“利益”的驱使得出“战争利益最大化”策略。《作战篇》讲:“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殫,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冑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这就是强调战争耗费太大,所以实行战事一定要根据自身条件而慎之又慎。

出于“慎用兵”的考虑,孙子认为要“全胜”,可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战争中获得利益最大化。一些学者也强调他的“全胜”思想,例如陈二林的《〈孙子兵法〉“全胜”思想及其启迪》等文章。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孙子兵法》关于“全胜”的论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这种全胜并非追求“和平”和“正义”,仍是保存自身利益的兵法谋略。试想,所谓“和平”,不应仅在于战争双方的人员、粮草、军备没有损耗,更应该基于双方主权的完整,而“全胜”

策略不过是要用“威”使敌国屈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本质还是侵犯敌国主权,这实在与“道义”难以关联。

诚然,《孙子兵法》中也有一些“修道而保法”之类的论述,但其论述是围绕着“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而言的,是强调“胜败”。换言之,“修道而保法”只是为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方法,而非以让百姓“安居乐业”为要。

从《论语》中可知,孔子对战争持反对态度。“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可知,侵犯别人的主权和地盘向来为孔子所不齿。孟子也反对不义战争,他在见梁惠王时,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总之,一者强调追求道义,另一者强调追求利益,二者在战争导向上有较大差别。

(三)二者待人之道不同

《周易》关于此事的解读非常多,本文摘取《乾卦》的《文言传》部分,用以管窥。《文言传》指出:“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所谓的“德”指什么?后文指出“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张善文解释道:“君子靠学习来积累知识,靠发问来辨决议难,胸怀宽阔而居于适当之位,心存仁爱而施诸一切行为。”^{[16]13}总之,《周易》强调,用“仁”等关怀他人,才能称得上君子。

但《孙子兵法》则不然。孙子认为,“兵者,诡道也”(《计篇》),大多数学者认为“诡”就是“诈骗”,用兵之人应诈骗对手,获得胜利。回归“诡”的原义,许慎认为“诡,责也”。责就是责令,多用于上级对下级的严格管理。为什么要严格管理士兵呢?“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虚实篇》)孙子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为将者应该以“智”当先,智则需要为将者做出远超常人的军事判断,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在孙子的时代,战争已从

“偏战”转移为“诈战”，例如泓水之战已是以礼为主战争形态的尾声，宋襄公已经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了。所谓“偏战”，就是二者约定好时间地点，通过战争布局而取胜，这是一种遵循常人思维的“军礼”。但是孙子则要求军事将领“反其道而行之”，专门“以强胜弱”，或者制造“以强胜弱”的战机以取胜，这就需要士兵严格服从军事将领的指挥，甚至抛弃自己的“常人思维”。据此，孙子甚至认为要“愚兵”，“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这也导致当代的孙子研究专家对其大为不满。吴如嵩认为，这是“剥削阶级愚兵政策的理论”^{[22]113}；郭化若指出，这是“剥削阶级军事家难除的糟粕”^{[23]193-194}；陶汉章指出这是“极端轻视士卒的地主阶级反动思想”^{[24]102}。《孙子兵法》共谈“仁”三次。第一次在《计篇》，强调将领选拔的五个标准“智、信、仁、勇、严”，但未对“仁”做进一步解释。第二次为《用间篇》“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这里所谓“不仁”是针对“情报水平”而言的，而非“道德情感”。第三次时孙子甚至利用儒家尊奉的“仁”，将其作为拉拢间谍的手段，“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篇》）。除此之外，孙子还要使用因间，即挑拨敌方的家乡人员探取情报，这与传统“里仁为美”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

《孙子兵法》讲：“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但在“文”的部分非常薄弱，曹操注解道：“文，仁恩；武，威罚。”^{[25]204}将“文”解释为“仁恩”，在《孙子兵法》中是缺乏依据的。同时，孙子的“愚兵”方略占据了很高甚至主导地位，因此他对“文”的建设也确有不足。杜牧和王皙注解此句只能借引司马穰苴和吴起，而不能从《孙子兵法》中寻得“内证”。“杜牧曰：晏子举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也；王皙曰：吴起云：‘总文武者，军之将，兼刚柔者，兵之事也。’”^{[25]204}

可见，《周易》强调的“道德价值”在《孙子兵法》中几乎难以寻得。《周易》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必然要强调“正能量”价值观；而《孙子兵法》则是“用兵之法”，它的价值观必然是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换言之，只要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切道德都可以予以让步。一者治国，一者取胜，二者待人之道的区别可见一斑。

三、余论

按上文，《周易》与《孙子兵法》的相关性较为有限。在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渐渐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周易》尤其是《易传》也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兵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渐渐用儒家思想内核解读《孙子兵法》。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汉代儒者对兵家的批判很严厉。汉昭帝举办盐铁之议时，文学、贤良很反对战争，认为“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尤其反对“废道德而任兵刃”^{[26]3}。《汉书·艺文志》认为，兵家败坏战争的风气，“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27]1762}。但汉朝北击匈奴、平定七国之乱等稳定政权的现实需要，也导致了兵学不可能完全被取消，而是要积极地融入儒家的价值观中。例如，同是“爱兵如子”的理论，《孙子兵法》讲“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这是有“尺度”的爱，而非“真正”的爱，意思是爱兵如子则可以让士兵心甘情愿地卖命，这与“非仁义不能使间”一致，都是将“爱”和“仁义”等作为利用士兵、情报人员的手段。《诸葛亮兵法》讲：“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注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诸葛亮兵法·哀死》）强调“身先士卒”，更重视人文关怀，“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诸葛亮兵法·和人》）。

到宋代以后，更是出现了“儒兵家群体”^[28]。宋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重文轻武”“崇文抑武”，但战争中的不断失利使“兵学”不可被放弃。儒家各学派诸如关学、闽学、洛学、濂学、浙东学派等的出现，导致儒学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强，同时加强了对所有领域包括兵学领域的渗透。魏鸿指出，《十一家注孙子》收录的四位宋代注家，梅尧臣是诗人，王皙、何氏和张预等人也并非统兵将领，宋代兵学研究主体文人化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表现。^[21]李静等学者指出，此时“以

儒解兵,援儒释兵,兵儒关系更为复杂,其内容和形式也纷繁多样”。^[28]^[24]从结果上看,此时的兵学只能尽力“融入”儒家的理念中。

明清时期,王阳明和曾国藩都有兵学著述,同时也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彼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军事格局及儒学地位的巩固,使兵儒结合发展到更深层次,甚至出现了将兵学纳入儒学体系的尝试。明代中叶后渐趋兴盛的实学思潮,更使许多儒者以务实的态度关注军事问题,最终促成了理论与实际并重、进而向专业化发展的兵家思想转型。

总之,儒学追求和平,强调用“义战”捍卫天道。兵学作为“争利”的理论,要在儒学为主的社会中发展,必须将儒学的理念融入自身。这种结

合在军事管理中意味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坚定的军人信念、更严格的阶级关系与更崇高的战争使命感等。儒学强调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以及政治对人的教化作用。《孙子兵法》秉持功利主义,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关系,经儒家熏陶后,人与人的关系有仁义礼信等方面。传统兵家更关注军人对战术的执行、君主对战争的支持、民众对战争的贡献等,切中实践层面,对这些群体的思想意识管理较少,经儒家熏陶后,人们对战争就有了更多意义上的理解,例如“忠君爱国”等。《周易》和《孙子兵法》的联系从最初的几无关系到不断互动融合,儒家思想不断推动孙子兵学精进、提升。

参考文献:

- [1]萧新永.论《周易》的兵法思想及其对《孙子兵法》的传承关系[J].孙子研究,2018(5):50-59.
- [2]吴荣政.论孙子军事哲学的思想源流[J].贵州社会科学,1999(3):101-105.
- [3]于国庆.《师》卦之兵法及其对《孙子兵法》的影响[J].周易研究,2006(3):90-96.
- [4]黄荣武.《周易》的战争性质观:师卦初爻新说[J].中华文化论坛,2002(3):138-141.
- [5]扈光珉,韩荣钧.《周易》与《孙子兵法》[J].孙子研究,2016(4):49-55.
- [6]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7]李学勤.《周易》与中国文化[J].周易研究,2005(5):5-9.
- [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9]鞠曦.易道元贞[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 [10]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1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
- [12]刘君祖.孙子兵法演义[M].上海:三联书店,2014.
- [1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14]周光庆.中国卜筮之书的哲学化道路:《易传》诠释方法论新探[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3-22.
- [15]朱冠华.孔子眼中的卜筮[J].周易研究,2002(6):24-33.
- [1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7]孟琢.齐物论释疏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8]冯友兰.三松堂全集:5[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9]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0]亓佩成.亚美尼亚文明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 [21]魏鸿.《孙子兵法》儒学化与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建构[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1):93-99.
- [22]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 [23]郭化若.孙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4]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 [25]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
- [26]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8]李静,姚振文.中国古代兵儒关系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

Re-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Art of War*

MEI Han¹, LEI Xueyang²

(1. *Sun Tzu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999020, UK*)

Abstract: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Art of War* draws on the wisdom of *The Book of Change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when Sun Tzu presented his book *The Art of War* to the Emperor of Wu Kingdom, Confucius had not yet begun compiling *The Companion to Changes*. Sun Tzu could only read the *The Book of Changes*, which was compiled by Emperor Wen of Zhou Kingdom for the purpose of recording divination and did not focus on discussing philosophical ideas related to the natural law and human nature. The Yin and Yang lines were only used for tying knots and recording events, and rarely discussed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s of *The Art of War* and *The Companion to Changes*, which emphasizes righteous warfare with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and morality as the main guidance, while *The Art of War* emphasizes the pursuit of profit with victory through attack and conquest as the main guidance. The war orientation and formation purpose of the two ideologies are quite differen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Confucianism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develop, Sun Tzu's military studies have gradually approached Confucianism, and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Confucianism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enriching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Key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ompanion to Changes*; *The Art of War*;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onfucian elements

(责任编辑:许 金)